

张澜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实践研究

陈瑜

南充科技职业学院, 中国·四川 南充 637200

摘要: 张澜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实践, 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 深受其滋养与浸润。他的传承实践不仅嵌入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基因, 更鲜明打上了文化传承、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的深刻烙印。张澜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实践, 在哲学思维根基上, 与传统“民为邦本”的民本思想具有高度契合性; 在道德行为准则上, 与传统“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具有高度统一性; 在实践价值理念上, 与传统“知行合一”“务实求效”的经世精神具有高度开放融合性。从实践维度看, 张澜的传承实践既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以民为本的核心价值内核, 凸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经世致用的实践理性思维, 又发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兼容并蓄、与时俱进的文化革新精神, 更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忧国忧民、以身许国的家国担当品格, 为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供了重要实践参照。

关键词: 张澜; 传统文化; 传承; 实践研究

Zhang Lan's research on the inheritance and practice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Chen Yu

Nanchong Vocational Colle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ina Sichuan Nanchong 637200

Abstract: Zhang Lan's inheritance practices of China's outstanding traditional culture are deeply rooted in the fertile soil of this cultural heritage, profoundly nourished and imbued by it. His efforts not only integrate the core gen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but also bear distinct imprints of cultural inheritance, cultural awareness, and cultural confidence. Philosophically, Zhang Lan's practices align closely with the traditional "people-oriented governance" concept; morally, they harmonize with the patriotic sentiment of "every citizen bears responsibility for national prosperity"; practically, they seamlessly integrate with the pragmatic spirit of "unity of knowledge and action." From a practical perspective, his work not only preserves the people-centered values and practical rationality of traditional culture but also develops its inclusive and progressive spirit of cultural innovation. Furthermore, it promotes the patriotic ethos of "national commitment and self-sacrifice," providing crucial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China's outstanding traditional culture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Zhang Lan; Traditional culture; Inheritance; Practical research

0 引言

张澜早年浸润于儒家文化深厚的乡土环境, 出生于四川南充耕读世家, 父亲为清末秀才, 自幼教他诵读“四书五经”, 母亲的勤俭与仁爱让他早悟传统伦理精髓; 少年入私塾师从当地名儒刘光第, 深受其“以天下为己任”的士人精神影响; 青年遍历川北乡村, 目睹底层民众“饥寒交迫、目不识丁”的困境, 更加深对传统文化中“民为贵”思想的理解。这种文化积淀塑造了他“为生民立命”的价值取向, 成为日后实践的思想根基, 无论教育中强调“实用救国”、政治中坚守“民主为民”, 还是处世秉持“刚正不阿”, 他都从传统伦理与文化智慧中汲取力量, 将其融入社会问题的思考与解决。在教育的过程中, 张澜坚持

民主爱国思想, 以爱国作为德育的核心^[1]。

张澜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实践呈“受滋养”与“作贡献”的双向互动: 一方面,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他提供精神滋养与实践指引, 其“民主建国”理念与传统民本思想一脉相承, “学用结合”主张契合传统经世精神, “清正廉洁”延续传统士人品格; 另一方面, 他立足时代对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将传统民本思想与近代民主理念结合, 使“以民为本”转化为“争取民权、保障民生”的政治实践, 将传统“耕读传家”教育思想与近代实用教育结合, 让“学以致用”服务“开启民智、振兴实业”的需求。这种“守正创新”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近代焕发生机, 拓展了时代价值。

本质上,张澜的传承实践是他作为近代知识分子对文化根脉的坚守,体现高度文化自觉与自信,他坚信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智慧、“经世”精神与“担当”品格能解决中国问题、凝聚民族力量。深入研究这一实践,既能梳理传统文化在近代的转型路径,也能为新时代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供借鉴,具重要理论与现实价值。

1 张澜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渊源

张澜生活于近代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期,从清末科举士人成长为国民民主领袖和新中国国家领导人,其人生轨迹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源于早年经历的文化浸润、救国实践中的文化自觉以及多元文化碰撞下的自信,形成了“以传统养精神、以实践传文化”的独特路径。

1.1 成长经历:儒家文化浸润下的价值奠基

张澜的文化认知与价值取向在青少年时期已通过儒家文化奠定根基。家庭环境中,父亲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教导子女,母亲以“仁爱孝悌”持家,形成“耕读传家”的氛围。私塾教育阶段,他师从名儒周铭旂,系统学习“四书五经”,深受《孟子》“民为贵”民本思想和《论语》“士不可不弘毅”担当精神的影响。家道中落后,他在川北乡村教书,目睹农民困苦,对传统文化“为生民立命”的内涵有了真切体会,从而形成“体用结合”的认知——既重伦理价值,也重现实应用。正如他在《我的教育观》中指出,传统文化非空谈,而是“救国救民之根本”,这一理念为其日后实践埋下伏笔。他学儒而不拘于儒,学墨而不偏于墨,重民意、重贤才,尚修养、尚力行,继承和融汇了儒墨两家的优秀思想并付诸社会实践,修身齐家治天下^[2]。

1.2 救国实践:传统文化指引下的路径探索

在近代中国救亡图存运动中,张澜以传统文化中的“家国情怀”与“经世精神”为指引,探索救国道路。甲午战争后,他深感民族危机,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并以“经世致用”思维寻求变革:1902年放弃科举,赴日考察教育,主张“以教育启民智,以实业救民生”。辛亥革命后,他任四川川北宣慰使,推行减租减税、兴修水利、兴办学校等政策,核心是践行“民为邦本”理念。抗日战争时期,作为民盟主席,他呼吁“团结御侮”,创办《民盟周刊》,发表《论中国文化之精神》,强调“仁”“和”为抗战的精神根基。在这些实践中,他将“民本”转化为“保障民权”,将“经世”转化为“兴办实业”,让传统文化在解决现实问题中焕发新生命力。

1.3 文化视野:多元碰撞下的自觉与自信

面对西方文化冲击,张澜避免“全盘西化”或“固守传统”的极端,坚持以文化自觉和自信推动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他批判“全盘西化”论,主张西学之长须与传统文化结合,否则“必致水土不服”。同时,他对传统文化进行扬弃:继承“民本”思想但反对“君为民主”,提出“民为主体,君为公仆”的民主理念;重视教育“修身”功能但摒弃八股模式,在办学中既设“国学概论”也开“自然科学”。他还通过文化比较彰显自信,指出中华文化“和而不同”“天下大同”的思想比西方霸权思维更具长远价值,强调包容与革新是文化自信的根基。这种视野使其传承实践既扎根传统,又顺应时代,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融合。

2 张澜传承实践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耦合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家国”“经世”“大同”等核心理念,是张澜一生传承与实践的精神源头,也与他的行动路径和价值追求高度契合。这种深层次的对应,既展现出传统文化的当代生命力,也折射出张澜一生实践的文化根基。

2.1 哲学思维:民本思想的当代践行

张澜的实践始终以“民为邦本”为哲学基础,实现了传统民本思想从“统治手段”到“民主核心”的现代转型。他在教育中主张“教育为民”,1904年创办南充蒙学堂时打破阶级限制,招收平民子弟,注重实用技能培养,旨在使教育真正服务于民生。在政治层面,他坚持“民主为民”,作为民盟领袖始终倡导保障民权、改善民生,1945年与毛泽东会谈时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解决土地与就业问题,体现“民为主体”的传统理念在现代政治中的延续。在社会实践方面,他发起赈灾运动、推广农业和手工艺技术,以实际行动回应“民生不安,则国无宁日”的古训。张澜的民本实践,既承续传统,更实现了其向现代民主价值的升华。

2.2 道德规范:家国情怀的毕生坚守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在张澜身上体现为贯穿一生的道德担当。清末他因反对“铁路国有”政策挺身而出,展现出“舍生取义”的传统精神;民国时期他拒绝蒋介石的高官诱惑,坚守“宁为平民,不为独裁之僚”的气节,延续了传统士人“刚正不阿”的品格;新中国成立后,他虽年事已高仍深入农村调研、建言农业发展,践行“鞠躬尽瘁”的责任伦理。张澜曾自述:“吾之道德,

非外来之教，乃吾国固有之训”，他的爱国、利民、尽责，与中华传统伦理高度统一。

2.3 实践理念：经世致用的时代转化

张澜强调“学以致用”，反对空谈，致力将传统文化转化为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他在教育中推行“学用结合”，1925年创办建华中学并设立农、工、商等实用科目，使学生兼顾理论与实操，明确教育应从“为科举服务”转向“为民生服务”。在实业方面，他1912年创办川北实业公司，融合中西技术并提出“实业不为暴利，要为民生”，延续并革新了传统“富民强国”的思想。在政治实践中，他秉持务实态度，抗战时主张“团结、生产、救国”三大实际任务，建国后反对冒进、强调稳步发展，体现出“经世致用”理念在时代的有效转化。

2.4 价值取向：大同均平的现实追求

张澜始终以“天下大同”和“均平富”为价值指引，致力推动社会公平。他批评贫富分化违背古训，主张“限制豪强，保障平民”，在四川推动减租减息以保护农民利益。在教育上，他倡导“教育均等”，通过低学费和助学金制度帮助贫寒学子，践行“大同”思想中的公平理念。在政治层面，他追求民主平等，反对一党独裁，1946年提出“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旨在实现从传统“天下为公”向现代“民主大同”的制度转变。张澜的公平实践，既源自传统文化理想，也直面近代社会矛盾，体现出价值追求与时代回应的一致性。

3 张澜传承实践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张澜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并非简单复刻，而是在坚守核心的基础上予以创新发展，既保留了传统文化的“根”与“魂”，又为其注入时代内涵，实现了传承与发展的统一。

3.1 传承：坚守“民本”“家国”“修身”的核心内核

张澜的实践深植于“民本”“家国”“修身”等传统文化核心理念。在“民本”方面，他将儒家“民为邦本”思想贯穿于教育、政治与社会实践中，推行平民教育、倡导民权保障、致力民生改善，并明确提出“吾一生所为，皆为‘民’字”，延续了以民为本的传统价值。在“家国”层面，他从反清救国、抗日御侮到参与新中国建设，始终以国家兴亡为己任，体现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在“修身”方面，他恪守传统伦理，清廉自持，秉持“诚、公、仁”的做人准则，其“布衣主席”的形象正是传统士人修身精神的当代体现。张澜对这些核心价值的持守，

使传统文化的精神根脉得以存续。

3.2 凸显：强化“经世致用”的实践理性思维

张澜特别强调“经世致用”，将这一传统思想转化为切实的行动指南。在教育上，他打破传统重理论轻实践的积弊，创办注重实用技能培养的学校，如建华中学强调“理论+实践”，毕业生多成为地方经济建设的骨干。在实业领域，他创办川北实业公司，推动就业与产业发展，践行“以实业促民生”的主张。在政治方面，他始终坚持问题导向，聚焦于团结抗战、民主建国和民生改善等现实议题。张澜的实践使“经世致用”不再停留于思想层面，而展现出强烈的现实效能，重塑了传统文化注重实践与实效的思维特质。张澜先生关心家乡实业发展，而特别是对南充蚕丝业发展更寄予厚望^[3]。

3.3 发展：推动“兼容并蓄”的文化革新精神

面对近代中西文化碰撞，张澜坚持以“兼容并蓄”推动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在政治理念上，他将传统“民本”与近代“民主”相结合，倡导通过民主制度实现民权，推动民本思想向现代政治制度转型。在教育方面，他融合传统修身教育与西方实用教育，提出“德技并修”，并采用启发式教学法，实现教育理念与方法的创新。在文化态度上，他主张以中华文化为本位，吸收西方民主与科学精华，延续“和而不同”的传统智慧，打破古今中西的对立，为传统文化注入新的活力。张澜的文化革新始终立足传统、面向现代，体现出在守正基础上的创新。

3.4 弘扬：彰显“家国担当”的士人品格

张澜以其一生行谊弘扬并升华了中国传统士人“家国担当”“刚正不阿”与“舍生取义”的品格。他以“天下为己任”，顺应国家需要从清末至新中国屡赴国事，展现出超越传统忠君观念的现代国家责任感。他秉持气节，拒斥国民党威逼利诱，晚年仍直言进谏，倡导实事求是，延续并光大了传统士人的风骨。在奉献精神上，他公而忘私，晚年捐书捐资，嘱咐家人“不向国家提任何要求”，体现了“先忧后乐”的高尚情操。张澜使传统士人精神在近代社会得以延续和升华，成为激励后人的宝贵精神遗产。

4 结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民本”“家国”等核心理念为后世应对挑战提供智慧支撑。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去寻找与现代民主政治相谐和的内容是张澜对现代中国文化重构的重要贡献^[4]。张澜是近代传承其文化的杰出代表，他以“文化自觉”姿态，将传统文化核心与时代需求结合，实现“传承”与“发展”统

一。从他的实践中可获三点启示：传承须立足实践，将文化智慧转化为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如张澜把“民本”“经世”转化为民生、教育实业实践；传承要与时俱进，对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如他将“传统民本”升级、“传统教育”革新；传承应坚定自信，在多元文化碰撞中坚守主体性，如他在西方文化冲击下不迷失方向。张澜实践是“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早期探索，对新时代传承文化有借鉴意义，能凝聚文化力量助力民族复兴。

参考文献：

[1] 谭军，赵正强. 民国时期张澜教育活动及其德育思想探析[J]. 兰台世界，2014,(25):55-56.

[2] 邵雍. 张澜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J]. 群言，2022,(04): 8-11.

[3] 刘华山，杜旭林. 张澜实业教育实践对当今高职教育的启示[J]. 中国成人教育，2008,(11):103-104.

[4] 苏蓉. 论“川北圣人”张澜[J]. 中华文化论坛，2010,(01):44-48.

基金项目：南充市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张澜研究中心，张澜研究中心 2025 年度科研项目“张澜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实践研究”（项目编号：NC25ZL22）。

作者简介：陈瑜（1992-），女，中国，讲师，研究方向：旅游教育。